

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6-0065-10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文凭新市民的社会特性分析

朱振亚

(井冈山大学商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文凭新市民具有八大社会特性,分别是: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情感上具有农村记忆性,心理上具有农村接纳性,生活上具有农村习惯性,交流上具有农村往来性;同时,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上具有高成本性,社会资源占有上具有比较优势性,工作范围上具有农村辐射性;此外,作为“农二代”和“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上还具有引领带动性。这八大社会特性,是文凭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粘合催化作用的重要情感和现实基础。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文凭新市民;农二代;城一代;社会特性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6.011

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一群独特的市民群体,那就是文凭新市民。何谓文凭新市民?本文界定“文凭新市民”为那些“首代进城落户工作且拥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县城为最低级别城市,文凭为普通大中专院校颁发的文凭)”。根据历年大中专院校录取人数及农村学生录取比率来估算,截止2014年年底,统计期内(1950~2010年)产生的“文凭新市民”基本都还健在(按城市人口平均寿命已接近80岁来推算;其中约有13万人已离世,可忽略不计),即我国健在的“文凭新市民”约有3500万人(一般估计),最少不少于2800万(保守估计),最大可达4200万(乐观估计)。可见,文凭新市民的人数总量相当可观。相对父辈而言,“文凭新市民”是通过教育通道从农村走出且进城的第一代人,是典型的“城一代”,故名“新”市民,他们已顺利完成市民化必经的身份“变态”和素质“变性”过程,深度或完全融入了城市,在社会身份上与其他市民并无二致,在个人内在素养上与其他市民没有根本差别,在工作性质及市民待遇等方面与其他市民也基本相似或者完全相同,不存

在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带来的种种歧视,所以说,他们已是真正的“新市民”,只是其“第一故乡在农村,第二故乡在城市”而具有很多独特的社会特征。那么,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数量巨大且拥有“农二代”和“城一代”双重社会身份的文凭新市民具有哪些独特的社会特性呢?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情感上具有农村记忆性

文凭新市民作为农家子弟,进城之前的近二十年,基本是在农村生活、接受教育并逐渐成长的。他们学习成绩相对优秀,部分人通过中考考上中等专业学校后“农转非”进城读书并留城工作,部分人通过高考考上高等院校后“农转非”进城读书并留城工作,当然,其中也不乏部分农家子弟从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先到农村就业,然后又通过各种选拔或参加研究生考试拿到硕士或博士文凭后进城工作的。虽然进城了,但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情感上浓烈的农村记忆性是非常明显的

收稿日期:2015-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及其触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CSH032)。

作者简介:朱振亚(1976-),男,安徽枞阳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与城乡一体化研究。

(这里的记忆既指记忆本身,也指对乡村的回忆与惦记)。文凭新市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农村“胎记”无法抹去,甚至这种农村的记忆、回忆或惦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

1. 怀乡念旧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国古代不少著名诗人曾写下诸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等思乡的千古名句。现代著名的思乡诗歌如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字字敲人心坎,句句令人感伤。还有不少思乡情是通过歌曲咏唱来表达的,如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程琳演唱的《故乡情》、李思琳演唱的《马兰谣》、朱晓琳演唱的《妈妈的吻》、美国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John Denver)演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故乡的路带我回家)》等经典名曲,如心灵鸡汤般慰藉游子。无论是诗句还是歌谣,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思乡情感。古代“文凭新市民”贺知章就曾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著名的《回乡偶书》,其中的离愁别恨和对岁月沧桑的感叹正是对上述思乡情愫最好的诠释。

2. 文凭新市民情感上的农村记忆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一词脱胎于涂尔干学派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1989年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出版,掀起了社会记忆问题研究的热潮。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这本书中用“社会记忆”一词代替“集体记忆”,并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他认为社会记忆具有传递性和连续性,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制约性^[1]。其实在保罗·康纳顿之前,社会记忆理论的萌芽就开始显现,如涂尔干认为各种宗教仪式是联结集体情感的社会记忆行动,滕尼斯认为记忆发挥着感激和忠诚的作用,因而是联结共同体的纽带。我国学者郭景萍的研究认

为,社会记忆既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一种情感体验过程,且情感生活是社会记忆的核心特征;社会记忆的过程是人的情感不断选择的过程,情感社会学关注社会记忆的情感价值,认为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使得社会再生产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波澜起伏的变化方式获得社会的连续性^[2]。

显然,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对农村的记忆是属于社会记忆的范畴。虽然文凭新市民进城后并未完全失去与农村的联系,但生活的主要天地不再是农村,而是在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城市里。也许文凭新市民在感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时候,农耕文明会在某个时刻爬上心头并与城市文明发生着碰撞甚或是交锋,“距离美”“渐渐的失去”以及“思乡的情怀”某些时候也许会帮其暂时的打倒城市文明,而使得内心的小天平倾向故乡和农村,感觉到只是属于故乡农村的美好。记忆、回忆和惦记的过程就像酿酒一样,时间越久就越香醇。从情感上看,“农二代”文凭新市民是一肩挑“两头”,一头挑起的是曾经养育自己的农村和故乡的亲人,一头挑起的是给予自己现代生活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小家庭。从人生历程来看,“农二代”文凭新市民又是“脚踩两只船”的,前脚踏着城市,后脚蹬着农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与人生经历的写照。正如情感社会学所揭示的那样,文凭新市民对故乡农村的这种社会记忆是城乡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力量源泉。

二、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心理上具有农村接纳性

俗话说得好,“人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鸡窝”,文凭新市民热爱故乡和故乡母亲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心理接纳比谁都具有先天优势。

1. “农村胎记”是文凭新市民热爱和接纳农村的心理本源

“农二代”文凭新市民在农村生活多年,进城后对农村的情感思念与社会记忆是客观存在的。母腹中时,是脐带将文凭新市民与母亲的生命紧紧连接起来;成长之时,是母亲甘甜的乳汁和谆谆叮咛滋养着文凭新市民渐渐长大,是故乡农村的

山山水水陪伴着文凭新市民逐渐成人;长大后,文凭新市民进城工作,但无论天涯海角,“情感的脐带”会将文凭新市民与家中的老母以及故乡母亲紧密地连系起来,母亲健在如此,母亲故去更然。文凭新市民这种“农村胎记”是与生俱来的,它会伴随着文凭新市民的整个人生。而正是这种“农村胎记”,决定了文凭新市民对农村的心理接纳和热爱是其他群体所难以比拟的。俗话说得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里的“母”既指生身之母,也指故乡之母,这里的“家”既指父母给自己带来温暖的人生小家,也指故乡农村给自己带来温情记忆的农村大家;“母亲”再丑、“家庭”再穷,在文凭新市民心里,这个“爱”字丝毫不会褪色。显然,“农村胎记”是文凭新市民热爱农村、接纳农村的心理本源。

2.“制度弥合”是文凭新市民心理上全面接纳农村的制度基础

制度弥合是指近年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有关推动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及城乡一体化取向的政策制度,已经并正在逐渐软化并最终消解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给人们带来的心理藩篱,有助于消除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间的心理隔膜与对立,有助于弥合城乡分治给市民和农民带来的社会心理裂痕,从而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制度与心理基础^[3]。

长期以来,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门紧闭,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市民是制度宠儿,农民是制度孤儿,两者享受的社会福利天壤之别,如王思斌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断裂状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的排斥,这种制度需要重构与弥合^[4]。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环境下,户口成为社会阶层分下的重要制度符号。文凭新市民通过考学艰难地“跳出农门”,实现了社会身份的“漂白”,成为城里人。但在城乡二元对立社会里,城乡文化与心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姜永志等的研究表明,城乡文化冲突既是文化的、社会的、更是心理的,这种冲突对城乡民众心理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人格、认知、情感以及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中^[5]。所以,在制度歧视下,文凭新市民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可以说是“想说爱你不容易”,即使是爱也是“爱在心头口难开”,甚至对农村和农民是“偷偷的爱、悄悄的

恨”,这是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心理裂痕^[6]。在这种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文凭新市民要真正接纳“三农”真的很难,因为文凭新市民不可能不受整体市民文化的影响,文凭新市民的从众心理(或羊群效应)还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这只是“违心”的从众。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弥合城乡关系的新政策和新制度,为软化和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为开创和构建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与心理基础。从2002年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概念,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年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调整和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的新思想、新政策和新举措,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是新时期软化和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构建城乡和谐关系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些新政策的颁布实施,既是对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关系的一种制度弥合,也是对存于人们观念中的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心理弥合。由制度弥合带来的心理弥合,使得整体市民社会对“三农”的歧视和偏见得以渐渐消解。因此可以说,“制度弥合”为文凭新市民全面接纳农村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和舆论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三、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生活上具有农村习惯性

文凭新市民在农村生活多年后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身份上发生了“变态”(即在户籍、居住地等外在标识上发生了改变),素质上发生了“变性”(即在生活方式、工作性质、个人素养、价值观念、行为范式等内在素质方面的彻底改造和提升),但文凭新市民在生活习惯上仍然会带有某些农村印记。

1.“农村基因”在文凭新市民生活习惯上打下了先入为主的烙印

刘坤亮认为社会由“基因”形成,“基因”在根本上决定社会的演进,社会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人口生产关系而非物质生产关系,所以认识社会的逻辑起点也应是人口生产关系而非物质生产关系^[7]。从人口生产角度来看,文凭新市民个体是在农村被“生产加工”出来的,也是在农村环境中熏陶长大,因此,文凭新市民进城后身上仍然带有

“农村基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长林认为,“系统发育受基因控制”是一条普遍规律,世界上不仅生物系统受基因控制,就是广及宇宙,次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系统,也无不受一定层次的、一定种类的“基因”控制^[8]。根据刘坤亮和刘长林先生的观点,文凭新市民即使进城了,“农村基因”必然还会继续得以表达,即先前在农村生活中养成的先入为主的生活习惯还要在城市生活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换言之,“农村基因”已在文凭新市民城市生活习惯上打入了先入为主的烙印。需要说明的是,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生活细节和个人偏好,后者侧重生活模式和生存状态。

2. 文凭新市民生活上具有农村习惯性的具体表现

文凭新市民在农村长大,生活习惯上会受到家庭环境及农村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熏陶和影响,在生活习性上烙上了比较明显的农村印记。即使进城做了新市民,其身上的“农村基因”仍然留存,某些乡下养成的生活习惯依然难改。比如北方农村长大但在南方工作的文凭新市民,由于吃不惯米饭,生活中仍然会以面食为主,如此情形生活中大有人在。一位大学教授曾透露,早年本科毕业他原本可去北京工作,但南方农村长大的他担心在北京吃不到香喷喷的大米饭,故而放弃了北京就业机会,后来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而自嘲。生活中,不少文凭新市民吃不惯城市的洋鸡蛋和色拉油,而偏好乡下的土鸡蛋和菜籽油等农产品,这也是文凭新市民生活上具有农村习惯性的一个例证。

文凭新市民生活上的农村习惯性往往还表现为过农历生日,而不是过阳历生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航天员聂海胜驾乘“神六”飞船在太空度过的41岁生日,当他的女儿聂天翔为爸爸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时,地面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因为聂海胜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初八,阳历10月13日,正好赶上“神六”飞天的时间;由于日期理解上的偏差,以致飞天程序上没有做出生日祝贺这一人性化的安排。聂海胜的太空生日说明文凭新市民在生日庆贺日期选择上也带有明显的“农村烙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文凭新市民生活上具有某些农村习惯性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年

少时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城市的延伸和继续。

四、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交流上具有农村往来性

文凭新市民进城好比是农村“闺女出阁”,“娘家人”与“婆家人”来来往往、走走亲戚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说,哪有“出嫁的姑娘”不惦记“家中爹娘和娘家人”的道理?因此,“农二代”文凭新市民在日常生活交流上也必然具有农村往来性。

1. 文凭新市民人际交流上具有农村往来性的具体表现

文凭新市民人际交流上具有农村往来性,且这种往来性具有城乡双向互动的特征。文凭新市民农村往来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凭新市民返乡探亲,二是文凭新市民乡下的亲朋好友进城探亲,三是文凭新市民及家人假日到农村休闲旅游,四是文凭新市民下乡考察调研或短期工作等。当然,农村往来性也包含运用现代信息工具(如手机、电话、QQ、电子邮件等)进行的交流和沟通。

就第一方面来说,由于父母双亲大多生活在老家农村,文凭新市民逢时过节特别是春节回乡探望父母基本成为文凭新市民们的“必修课”。但能否“常回家看看”要取决于文凭新市民工作的性质,也许有些人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但这毕竟是少数。即使父母双亲作古了,文凭新市民回乡祭祖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文凭新市民的回乡探亲之旅,同时也是与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乡里乡亲以及昔日老师同学的聚会和情感交流之旅,这方面的交流互动成为文凭新市民返乡探亲活动的重要内容。就第二方面来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尚往来,乡下的亲朋好友偶尔进城到文凭新市民家中做做客也在情理之中,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其中也不乏客人是来请求文凭新市民帮忙做事的,因为在农村乡亲们看来,文凭新市民是家乡飞出去的“大能人”,见过世面,有门路、吃得开,似乎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所以遇到困难向文凭新市民求助就自然而然。就第三方面来说,随着“农家乐”等农村旅游业态的兴起,双休日或节假日去农村休闲旅游就成为新市民家庭一种新的生活时尚,新市民和家人从中可以体验农家生活、享受农耕文明、欣赏乡村文化、感受自然风情,同

时也有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进步。就第四方面来说,有些文凭新市民从事涉农工作或工作上与“三农”有交集,有时需要下乡开展调研、指导或考察等工作,或下乡从事某方面的农村帮扶结对工作。也有些文凭新市民走进农村是为了进行中短期的挂职锻炼,如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同志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在小岗村呆了近6年时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去世后,其墓建在小岗村,英灵与小岗永远同在。他是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事迹被拍成影视剧《永远的忠诚》和《第一书记》等(沈浩同志老家在安徽萧县圣泉乡孙秦庄村,1986年从铜陵财专<现铜陵学院>毕业后进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凭新市民)。

2. 农村往来的主动权掌握在文凭新市民手中

文凭新市民在上述四种人际交流中掌握着农村往来性的主动权,其自身意愿和态度决定了农村往来性的频度、热度和深度。

俗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文凭新市民节假日携带配偶和孩子回乡看望父母或祭拜祖先,是人之常情,也是自身情感的一种需要。但这种回乡探亲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文凭新市民手中,如什么时候回去、回去带多少东西、在老家呆多久、回家要与哪些亲朋好友进行互动等,基本是由文凭新市民的意愿所决定,这个决定既受主观情感因素影响,也受其它条件限制。

乡下亲朋好友进城看望文凭新市民,用霍斯曼的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是一种人情交换行为^[9]。如袁静的研究表明,在人情往来中,人们往往会考虑对方是否具备他们所需的资源或条件,并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权利来判断实现自身欲望的可得性,如果对方“给面子”,他们就获得了获取资源的机会,倘若对方不作回应,那么人情往来就会中断^[10]。文凭新市民进城工作是“人往高处走”的一种社会表现,所以,在老家亲朋好友看来,与文凭新市民交往是一种“高攀”行为,如果这种交往不是发生在嫡亲的血缘关系中,则这种交流往往还具有心理和社会位序上的“非对称性”,即这种交往不是“门当户对”的,若文凭新市民招待进城亲朋好友不够热情或未能对其所求之事做出积极回应,换言之,就是没“给面子”,则这种后续交往的可能会受挫甚至会中止。因此,从

这个角度讲,文凭新市民掌握了农村亲友与其来往交流的主动权。

双休日或节假日是否去农村休闲、旅游、吃农家饭等,完全取决于文凭新市民及其家庭成员的喜好,当然如果有私家车或交通便捷,去农村休闲的可能性会大些。但即便交通条件再好,去与不去的问题始终还是由文凭新市民及其家庭成员来决定;即便下乡了,去哪里、带几个人、吃什么、消费什么、呆多久等问题也完全是由文凭新市民来主导。至于工作上与农村的往来性,虽然有些事务是由工作性质或上级领导安排所决定,但文凭新市民在其中也有其主导性的一面,比如在考察调研或对口支援农村目的地的选择上、在情感投入和工作开展方式等方面,以及对农村挂职锻炼机会的把握、挂职锻炼地点的选择、挂职时工作态度的取向、挂职时间长短等方面,文凭新市民仍发挥着较大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而这种主导性直接决定了文凭新市民涉农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五、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城市安家落户上具有高成本性

文凭新市民进城工作,改写了其祖祖辈辈在农村务农的历史,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进城工作就意味着文凭新市民将成为其所在城市的“一世祖”或“始祖”,也即本门香火将从文凭新市民开始在城市代代传承。但文凭新市民作为进城的“一世祖”或“始祖”,其城市“基业”的开拓并非一马平川,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凭新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具有高成本性,且市场经济时代文凭新市民的安家落户成本要显著高于计划经济时代。安家落户上的高成本可能对文凭新市民反哺农村行为造成经济上的制约。

1. 计划经济时代文凭新市民安家落户需要较高成本

计划经济年代,文凭新市民在住房方面可以享受福利分房,这为其在城市安家落户节省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即使有了福利房,但初进城的文凭新市民在城市的“出场费”并不低,因为他们在城市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置办家庭必需的生活设施等方面都需要花钱,而白手起家的他们,往往会陷入经济窘境,一方面是因为文凭新市民上班时间不长,工资级别低,个人积蓄少,另一方面是

因为经济上还难以得到农村父母的大力“支援”。文凭新市民之所以在农村无“巩固的大后方”,是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土里刨食的父母除了微薄的农业收入外基本再无其它收入来源,扣除农业税、农业生产成本及其它家庭开支,父母是“挤”钱甚至是借钱来供文凭新市民及其兄弟姐妹上学读书。父母把孩子们养育成人已属不易,不可能再有多余的积蓄来支持子女进城安家落户。如涂瑞珍等的调查研究表明,目前上海城乡居民家庭基本上只能支付初中及以下层级的公立教育费用,但是高中及以上层级的教育支出对上海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居民)家庭仍有较大的影响^[11]。发达地区尚尤如此,其它地区情何以堪。因此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进城安家落户需要承担较高的经济成本,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

2. 市场经济时代文凭新市民安家落户需要更高成本

与计划经济时代文凭新市民相比,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凭新市民进城安家落户需要承担更高的经济成本,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因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必须跨越就业难和买房难等多重门槛。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拉开了扩招的序幕,曾经的精英教育也随之蜕变为大众化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增长,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其中,农村籍大学生所受冲击最大。如曹绍平研究认为,农村大学毕业生就业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大学毕业生^[12]。杨会芹等研究认为,农村大学生在高校生源中占绝对优势,可利用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就业状况更加不容乐观^[13]。所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普遍遭遇就业难题,留城工作的难度更大。

即使部分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如愿留城工作,成为文凭新市民,但又要承受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高成本,其中最大的一笔开支非住房莫属。近年来,城市“蚁族”成群就是对文凭新市民买房难现状的一个很好背书。沈然在武汉的调查表明,“蚁族”大都来自农村,收入低(月收入普遍低于3000元),生活压力大。文凭新市民若要买房,又将沦为“房奴”^[14]。如吴银涛等的调研结果表明,城市青年

房奴在自身经济能力不济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向父母要钱的方式来支付首付,首付以外的资金一般来自银行贷款,一些青年房奴的新房装修费用也要父母来赞助,而新婚夫妇双方父母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多年的积蓄或养老金^[15]。可见,作为青年房奴群体之一,安家落户上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还要“啃老”。高房价与城市生活的高成本,显著降低了文凭新市民对城市工作、收入和生活的满意度^[15-16]。

六、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具有比较优势性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中心,是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集结点,城市以其独有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吸引着大量的资源向城市集中,现代城市已经成为各种资源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17]。与农民相比,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不同程度地控制和支配着多种社会资源,当然,不同社会能级上的文凭新市民对社会资源的支配状况有所差别。

1. 与农民相比,文凭新市民控制和支配着多种社会资源

与自然资源丰裕度较高的农村相比,城市是社会资源聚集的高地。所谓社会资源是指自然资源以外的其它所有资源的总称,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包括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环境和社会关系资源等^[17-18]。与农民相比,文凭新市民群体在社会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上占有比较优势。文凭新市民分布在城市不同部门,控制和支配着多种社会资源,如在政府工作部门的文凭新市民可以控制和支配某些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政府某些直属事业单位如旅游局、房地产管理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工作的文凭新市民控制和支配着某些经济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政府垂直管理机构如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供电局等单位工作的文凭新市民同样也能控制和支配某些经济资源和管理资源,在一些具体事业单位如学校、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部门工作的文凭新市民控制和支配着某些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等。

社会资源如其他资源一样也具有稀缺性,因

为按照戴维·波普诺的观点,社会资源是指“所有有价值的稀缺物”^[19]。所谓资源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无限增长的需求而言,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资源总是有限的,相对不足的资源与人类绝对增长的需求相比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20-21]。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年年“高烧不退”就是追逐社会资源的一个有力例证,因为考上公务员不仅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还意味着有机会直接或间接掌握和控制各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与农民相比,位居政府、公检法、研究所、大中专院校、医院、银行、交通管理等部门单位的文凭新市民在各种稀缺社会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上确实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文凭新市民回报、反哺农村的重要前提,也是他们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社会基础。

2. 文凭新市民所处社会能级有高有低

“能级”一词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原意是说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绕核运转的电子构成,电子由于具有不同的能量,就按照各自不同的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即能量不同的电子处于不同的相应能级。这种能级现象在社会学中同样存在。社会能级是指不同社会层级上的人具有不同等级或不同大小的社会能量,这个社会能量主要表现为影响、调动、控制、支配和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19][22]}。文凭新市民对社会资源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因人而异,不同社会能级上的文凭新市民其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能级越高,控制力和支配力越强,能级越低,控制力和支配力越弱。换言之,不同部门的文凭新市民之间其社会能级高低有所不同,如市长与农业局局长所处的社会能级就不同;相同部门的文凭新市民之间其社会能级高低可能也会有所差别,如中学校长与中学普通教师所处社会能级也不一样。俗话说,“人分三六九等,肉有五花三层”,按照社会能级来看,文凭新市民的社会能量有高有低是很正常的。那么,社会能级如何识别呢?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力告诉我们,社会分层的标准有简化的趋势,劳动分工与职业成为判别阶层身份的主要标准,因为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的主要差别外显的标志是源自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行业差别或职业差别^[23]。因此,按照朱力教授的外显标准,就比较容易识别出文凭新市民所处的社会阶层或社会能级。

七、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工作范围上具有农村辐射性

文凭新市民在城市不同部门工作,有些文凭新市民从事的是“农口”工作或“涉农”的工作,有些文凭新市民的工作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涉农”性质,但在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下,其工作范围也可能外延并影响到“三农”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

1. 有些文凭新市民的本职工作直接具有农村辐射性

“辐射”也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的是能量以电磁波或粒子的形式向外扩散;辐射的能量从辐射源向外面所有方向直线放射,物体通过辐射所放出的能量,称为辐射能。文凭新市民处在较高的社会能级上,其社会能量也会向外辐射,但与自然粒子向所有方向直线辐射能量不同的是,文凭新市民社会能量的辐射具有可控性和定向性,即辐射是向目标方向辐射,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浪费,使“辐射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

不少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其工作范围是“涉农”或直接为“三农”服务的,若以江西省省级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为例,则江西省农业厅、江西省林业厅、江西省水利厅、江西省粮食局、江西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西省红壤研究所、江西省防汛信息中心、江西省农业委员会、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农村发展银行等均是“农口”单位,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交通厅、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厅、江西省民政厅、江西省环境保护局、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均是“涉农”单位。显然,在“农口”系统和“涉农”系统就职的文凭新市民工作上就具有农村辐射性,他们可以利用工作职权及其支配的社会资源在法规范围内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为城乡一体化服务。

2. 有些文凭新市民在工作性质的外延上具有农村辐射性

2007年,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先生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认为,必须以制度创新来促进我国的城

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包括财政、金融、投资、产业、就业、土地、户籍、行政管理等方面政策在内的配套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24-26]。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动员和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投入其中,实施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城乡对接”,以城带乡,以工哺农,推动城乡一体化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城市所有部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环境,为城市各部门文凭新市民在工作上辐射农村创造了条件,换言之,这些文凭新市民在工作外延上也具有农村辐射性。

除“农口”和“涉农”单位以外,其它部门或单位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过程中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如在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公安厅、……、江西省妇联、江西省城市各民间组织、各大中专院校、城市各中小学、城市各医疗机构、城市各大银行与有关企业等部门或单位就业的文凭新市民,在工作外延上就具有农村辐射性。他们可通过多种形式的结对帮扶,如厅局帮扶村庄、学校帮扶学校、医院帮扶医院等多种形式,将城市资源和能量辐射到农村,助推城乡一体化更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凭新市民的农村辐射性可能因其出身农村而表现得更加强烈、更为明显。

八、作为“农二代”和“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上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文凭新市民作为“农二代”和“城一代”,其身上具有很多独特的社会属性,这些社会属性决定了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上具有潜在的引领带动作用。

1. 横向比较,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上具有更大的引领潜质

“城一代”文凭新市民与老市民(城市“土著”)横向比较来看,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中具有更大的引领潜质,因为“第二故乡在城市,第一故乡在农村”的文凭新市民,无论在情感上、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三农”的接纳、怀念与感恩之心始终存在,机缘成熟,文凭新市民反哺农村、回报乡里、引领城乡互动发展完全顺理成章。其实有些文凭新

市民已经在行动,如中国首善陈光标,他是农家子弟,曾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30岁时开始慈善事业,其中很多慈善捐赠是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陈光标带领120名操作手和60台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千里救灾,救回131个农村生命,其中他亲自抱、背、抬出200多人,救活14人,他还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过亿元;2011年9月25日,陈光标在贵州毕节政府广场举办了主题为“一路慈善一路歌”的慈善演唱会,并现场向农民派发3000头猪羊,捐赠100台农用拖拉机,等等,类似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有些文凭新市民的“哺农”作用是潜在的,需要去触动和引发。

2. 纵向比较,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中具有更大的引领作用

纵向代际间比较来看,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哺农”过程中要比“城二代”和“城三代”具有更大的引领带动作用,换言之,文凭新市民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具有代际“衰变性”,即随着代际的繁衍和延续,“城二代”和“城三代”对农村和农村故乡的认同感越来越弱,甚至会完全“失忆”。因此,就“哺农”和城乡互动引领带动作用而言,“城一代”文凭新市民的社会价值应是最大的。

代际间之所以存在“衰变性”,是因为包括“哺农”引领作用在内的文凭新市民身上的种种社会特性,都具有代际“遗传”和“变异”的可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遗传是指生物子代与亲代相似的现象,变异是指子代与亲代及同亲本的子代个体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差异^{[27](P1-3)}。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遗传是指人的社会实践能力或社会文化成果的传递和积累;它是人的后天能力的遗传,遗传方式是以超生命、超机体的遗传方式进行的,社会遗传是开放式遗传,即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实现的;“教育”是实现社会遗传的唯一途径^[28-29]。因此,从遗传学角度来理解,“城二代”和“城三代”不仅从生物学角度遗传了“城一代”文凭新市民的部分生理特征,也会从社会遗传角度继承了文凭新市民的很多有关农村、故乡、亲人等“认祖归宗”的情愫。

但随着代际的延续,这种“认祖归宗”情愫会越来越淡,这又是社会变异作用的结果。“社会变异”一般多见于语言学研究^[30-31],相关研究并未对其内涵做出界定,是为遗憾。本文认为,社会变

异是指人的社会实践能力、社会文化或情感认知在传递和积累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代际改变。从这个角度讲,“城一代”文凭新市民通过言传身教将有关农村、故乡的情感认知传递给“城二代”和“城三代”,但在这个社会遗传的过程中,社会变异也随之发生,即“城一代”文凭新市民传递的农村情愫在后代会“变形走样”,这是生活环境变化造成的,因为“城二代”和“城三代”缺少农村生活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种遗传下来的农村情感认同和城乡互动会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消失殆尽。

因此,从社会遗传和社会变异的角度来看,“城一代”文凭新市民将比“城二代”和“城三代”在“哺农”和城乡互动中具有更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因为“城一代”更“亲本”、更“亲农”,而文凭新市民的“亲本”、“亲农”是其“近农”、“哺农”的重要情感基础。

总结:综上所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文凭新市民具有八大社会特性,这八大社会特性分别是:(1)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情感上具有农村记忆性。(2)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心理上具有农村接纳性。(3)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生活上具有农村习惯性。(4)作为“农二代”的文凭新市民交流上具有农村往来性。(5)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城市安家落户上具有高成本性。(6)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社会资源占有上具有比较优势性。(7)作为“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工作范围上具有农村辐射性。(8)作为“农二代”和“城一代”的文凭新市民在“哺农”上具有引领带动性。这八大社会特性,是文凭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粘合催化作用的重要情感和现实基础,其中,城市安家落户上的高成本性对文凭新市民的城乡粘合催化作用可能会产生某种制约,但其它七大特性均将产生正向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 [2]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J].学习与实践,2006,(10).
- [3] 王乐君.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实践与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4] 王思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断裂与弥合[J].江苏社会科学,2004,(3).
- [5] 姜永志,张海钟.文化心理学视域下的城乡文化心理差异分析[J].社会心理科学,2009,(5).
- [6] 张传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 [7] 刘坤亮.社会“基因”形成论[J].江汉论坛,1993,(10).
- [8] 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J].哲学动态,1988,(11).
- [9] 佟丽君.论霍曼斯的人际交往理论[J].求是学刊,1997,(1).
- [10] 袁静.人情往来: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运作方式——基于L市的人情往来调查[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11] 涂瑞珍,林荣日.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21).
- [12] 曹绍平.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心理障碍分析及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3,(5).
- [13] 杨会芹,刘晖,崔淳熙.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分析与思考——基于2012年对河北省十一地市的实证调查[J].河北学刊,2013,(4).
- [14] 沈然.中国梦视域下“蚁族”问题研究——以武汉市为样本[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15] 吴银涛,胡珍,陈敏.城市青年房奴现象的产生及生存发展状况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2).
- [16] 张连城,赵家章,张自然.高生活成本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2)[J].经济学动态,2012,(7).
- [17] 夏芳晨.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机制研究[D].哈尔滨: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 [18] 李勇.论国家汲取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催生的变革[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4.
- [19] 刘祖云,胡蓉.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一项对中国中部城市的社会分层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6,(6).
- [20] 陈祥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资源配置[J].社会科学,1998,(7).
- [21] 李国和.就业岗位:一种社会资源稀缺及其原因[J].求索,2010,(6).

- [22]刘鹏发.浙中城市群城市能级提升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23]朱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趋势[J].社会科学研究,2005,(5).
- [24]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 [25]陆学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实现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 [26]韩俊.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J].理论视野,2010,(3).
- [27]卢良峰,路文静.遗传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 [28]刘福森,张静.历史进化的谜底:社会遗传[J].理论探讨,1995,(6).
- [29]吴克昌.论社会遗传与社会发展[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 [30]侯维瑞.英语的社会变异[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7,(3).
- [31]梁兵.从新词新义看社会变异[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ploma-bearing New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urge

ZHU Zhen-ya

(School of Busines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urge, many diploma-bearing citizens inflow into cities. They display eight majo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hild of peasant", they are characterized in emotional belonging to countryside, psychological rural acceptance, rural living habit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rural area. At mean time,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in city" they face higher costs of urban settlement, possess better advantages in social resources and work at area adjacent to their hometown. Besides, this group as a mix of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city-to-village-feedback efforts.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ploma-bearing new citizens provide important emotional and physical basis for consolidating and facilitating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ploma-bearing new citizen; child of peasants; first generation in city; soci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曾琼芳)